



资料下载

- 马克思主义论坛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改革与发展
- 经济研究
- 海派经济学季刊

站内搜索

搜索

当前位置: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 资料下载 >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国外学术界热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布时间: 2009-12-30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成为西方左翼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争论的焦点涉及它的性质。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某些西方学者对中国国情尚需了解, 这场争论还将进行下去。国际范围内的这场争论, 对于我们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营造有利于这项事业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特殊论: 中国的体制与文化

洪朝辉(美国普渡大学教授): 中国特殊论的论证基点是: 第一, 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 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 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它是权力和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 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 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 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

第二, 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社会阶级。最令人瞩目的是, 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 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 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 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所期望的类似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 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

第三, “中国崩溃论”之所以至今无法应验, 主要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所特有的“有效稳定”和“内部制衡”的政治文化机制缺乏认识。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 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溶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以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 但自古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 如天制衡帝、官制衡士、宦官制衡外戚等。正是中国政治的治理结构中, 始终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 所以中国的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调整, 保存并延续了中国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中国特殊论”建立在价值中立的基础上, 这一判断和解释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目标, 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 完全是依据中国近30年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 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如果中国发展能够持续, “中国特殊论”的命运有可能像“美国例外论”一样, 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中国并非处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

大本一训(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有人认为, 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初期, 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其依据是: 1.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是通过导入市场经济来实行“休克疗法”, 而是以承认、培育私有经济为开端, 进一步承认其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并逐步使之扩大的渐进式政策; 2. 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与大量脱离农业的劳动者; 3. 从中国当前的单位制和户籍制来看, 消除因经济地位差异而形成的对人格的制约以及迁移自由的确立, 将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他们认为, 这一点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很相似。然而, 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是对直接生产者的掠夺。伴随这一过程的是农民的土地被掠夺、居民日益分化为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等现象。与此相反, 中国在导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除个别现象外, 并没有出现对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夺, 而是采取了保护和奖励自由职业者与个体经营者、防止失业问题恶化和两级分化、努力促使社会中间阶层形成的政策。

领导中国经济运行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 这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绝对主义权力截然不同。其中的人民代表都是由选举产生, 全国人大多方面发展了议会的功能。另外, 由私人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民阶层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向政府的政策提出要求和批评。因此从中国政治的现状看, 也不具备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原始积累时的特征。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不是暴力, 而是遍及金融、劳动、社会保障、产业、环境等各领域的经济政策。

站在全世界的十字路口

彼得·诺兰(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 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 那么我们可以说, 中国2000多年来一

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

在最近数十年里，欧洲一直在探索它自己走向“第三条道路”的方法，然而，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它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人口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而且中国仍然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中国现代部门日益被国际资本控制，从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作为参与国际经济的代价，中国面临着把金融体制全面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中国领导人正在这个独特的富有挑战的环境中努力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中国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主要趋势之外。它不可能掉过头来回到毛泽东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中国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能够阻止“中国的金融危机”吗？它能够解决中国快速增长的社会不平等吗？它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吗？它能使中国的大公司在“全球运动场”上进行竞争吗？它能使中国解决巨大的国际关系挑战吗？它能解决中国的环境危机吗？它能为中国建设一个具有社会凝聚力的社会提供道德基础吗？不管是在生态、社会还是在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也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的历史传统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由于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所以，中国自己的生存可能提供了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走向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从而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的显著特色

托马斯·海贝勒(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这一阶段有五个特征：1. 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2. 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3. 新政治精英出现；4. 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5. 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并影响政治体制。

这种实用主义的特征如下：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许多事例都表明了这种政治实用主义，例如，经济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发展过程中允许私人成分的加入、允许外资的流入、认可社会的急剧变化等。

中国模式已上升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雷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可以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

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及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即“北京共识”。“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北京共识”就这个问题展示了三条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超快速的变化，使中国发展速度足以解决改革中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把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集中于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世界大多数地区在不知新的发展范例为何模样的情况下，“北京共识”为世界带来了希望。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核心概念，如创新、不对称性、注重平等、探索有关公民地位的新思想，正在吸引那些怀着追求发展与安全的雄心、但数百年来看到的却是由于过度依赖发达国家援助而接连失败的发展模式的国家。“北京共识”使每个国家都看到了靠自己成为一个强国的希望，虽不至强大到足以称霸的程度，但至少可以强大到实行自决。

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不破哲三(日本共产党资深领导人、理论家)：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建国的努力方向。“新经济政策”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提供了借鉴。中国的发展进程是

基于与列宁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所持的思想相类似的基础之上的。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在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来的“新经济政策”的阶段。

但是，由于历史的不同，列宁时代和今天的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途径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列宁时代，为了得到技术上的援助来促进苏联的发展，列宁欢迎外国资本主义参与苏联的建设，并为这些企业提供各种“特权”，目的就是要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经商之道，但真正到苏联去的外国企业并不多。相反，今天的中国正吸引着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资本，但中国社会主义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同时，还要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且不能被它们所吞并，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象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

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关键是中国怎样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它又应该怎样使社会主义的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竞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好坏两方面，虽然各国建立社会主义可能会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途径将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因此，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具有全球意义。

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

利奥·刘(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副教授)：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它所带来的快速的经济增长对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WB)而言是一种政策上的挑战。IMF以及WB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有两个关键性的要素——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中国党和政府显然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标准的IMF以及WB的方式是支持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使用“未被扭曲”的市场价格(包括工资)来配置资源的。对市场的政治干预、国有制、对经济部门的管理以及任何形式的战略性的产业政策都是与这种模式不相容的，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与这种模式完全背离的市场经济。

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的市场改革所采取的是“大爆炸”式的道路，它们更加紧跟IMF以及WB的指示，与之相比，中国的市场改革一直是渐进性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性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在中东欧国家垮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没有垮台，因而不存在相似的用市场代替中央计划以及将企业私有化的狂热，相反，市场和私有企业只是对计划和国有制的补充。

就像诺思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迈向市场改革的道路是渐进的，可以用两个词来描述：“摸着石头过河”和“帕累托式改进”(Pareto-improving)。前一个词指的是党重视试验，后一个词指的是党规定的政策尽可能使中国的情况不因为经济改革而恶化。这一政策反映了党防止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的出现以及避免社会冲突的真诚愿望。

1993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用市场和公共所有制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和国有制，将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以及作为其两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柱。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看起来能够通过吸收那些在市场改革中获得权力的新的社会阶层来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从而成功地实现自我创新。

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

托尼·安德烈阿尼(法国学者、国际马克思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理由如下：

1. 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经历50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力。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必须摆脱“贫穷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进入更高级的阶段。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特点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的集中。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鼓励，它占工业生产的1/4，国内生产总值的1/3。国有企业数量的减少是因为进行了资产重组，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一些国有企业交给了地方政府，还有一些企业成为集体企业，但它们仍属公有经济范畴。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经过了20多年的奋斗，才逐步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例如商业银行制度、取代直接提取企业利润的税收制度、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而且这些改革还远远没有完成，这正是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3. 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

4. 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中国的特点，因为它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此外，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

作者:徐觉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摘自《社会科学报》2008年4月24日、5月8日)

